

## 開卷未必有益

據內地媒體報道，為掀起閱讀熱，有領導推出「量化管理」的措施，如某大學規定學生每年必須讀課外書多少本；某城市評出的「五好家庭」起碼得藏書多少本。此類做法受到批評：現代社會中，每個人的時間都特別珍貴，能來享受閱讀的時間需要格外珍惜。愛讀書，不是因為這種品質是一個人優秀的標籤，而是因為讀書是幫助我們尋找優秀品質的途徑。這條尋找的路，有人嚮往天涯海角，有人只想安居一方，無論是多而廣，還是少而精，他們都是自由的、無悔的，都可以成為優秀的人。怕的只是沒有安居者的怡然自得與堅韌，亦不具備遠行者的勤奮開拓與品位，連堅持長期閱讀的定力都沒有，又去盲目追求讀書數量，這不是奔向遠方，是流放。

筆者年輕的時候，口糧要計劃供應，母親給兒子盛飯，要盛滿滿的一碗，還要添上一句「人是鐵，飯是鋼」，因為那時吃飯是頭等大事。在精神產品稀缺之類，人們也會講「開卷有益」之類的話。而如今可供閱讀的材料目不暇接，該如何作選擇性閱讀便成為公眾話題。吃的不衛生，身體要出狀況。閱讀不衛生，問題可能更大。作家韓少功小結出幾條閱讀的「衛生常識」，很值得讀者們借鑒。

他認為，首先不可暴食。人不可飲食過量，閱讀的節奏和規模其實也須保持在合理範圍。身處一個知識爆炸和信息過剩的時代，遍讀天下書既不可能，也無必要。刷屏刷到手抽筋，翻書翻到兩眼黑，倒容易讓壞胃口，讀亂心智。孔子說：「學而不思則罔，思而不學則殆。」這就是說，「學」要與「思」兩相匹配，若不給「思」留下足夠的時間和腦容量，「學」便可能淪為一知半解，生吞活剝，雜亂無序，甚至嚴重消化不良。這種激進閱讀不把自己讀成一個龐雜信息的垃圾桶，恐怕也難。

其二，不可偏食。人需要營養均衡，其閱讀面也應合理分布。專業知識太窄，心理自閉多見，如此等等，與當下很多人的閱讀範圍狹窄經常互為因果。相反，讓閱讀跨專業（理科生讀一點文科書籍，反之亦然）、跨年齡（老年人讀一點青年讀物，反之亦然）、跨立場（激進派讀一點保守派作品，反之亦然）、跨文化（基督徒讀一點儒家經典，反之亦然）……來一個多元互補和遠親雜交，必有助於人們開闊視野，健全心智，快樂人生。

其三，不可錯食。任憑娃娃們接觸暴力、色情的讀物，肯定是一種心理上的「病從口入」。長時間泡在快餐文化裡，也無異於把零食當主食，伏下重大的健康隱患。在人生經驗缺失或錯配的情況下，年少者讀《紅樓夢》是石上種豆，打拚者讀《五燈會元》是緣木求魚，消沉者讀虛無主義是雪上加霜，淺學者讀後現代主義是飲鳩止渴……垃圾讀物暫且放下不提，即便是那些富營養食品，其實也都有風險，一旦缺乏相應的接受條件（閱歷、心態、基礎知識、實用需求等），就如濃甜之於高血糖，肥膩之於高血脂，再好的東西也可能成為毒藥。在這裡，治病並不都是「大方子」就好，讀書也不都是大部頭、新品牌、高格調就好。多一點因地制宜，多一點循序漸進，可能是更好的選擇。

此外，多運動才能促消化。書本並不等於知識。知識更不等於能力。讀書充其量只是一種「半教育」。王陽明說過：「知為行之始，行為知之成。」這話的意思是，讀書的成功不在於學舌，而在於有為；不在於照搬前人結論，而在於探知前人的得失過程和操作智慧，從中汲取創造性能量，進而推動自己在新條件、新問題、新任務情況下的「知行合一」。完善的教育，成功的讀書，其實須延伸到摸爬滾打上天入地的相關實踐中去，延伸到活學活用的「一輩子」中，把「讀」的過程變成一個「做」的過程，把口舌之學變成身心之學。這就像一個健康人總是要靠運動、勞動、行動來增強胃動力，把食物輸入最終轉化成自己的心靈手巧和身強力壯。

如是見

## 會國藩「求闕」的深意

金文欽



人與事

一位朋友為他會所「闕」取名，要我出個主意。說不要「完美」，「至美」之類的詞意，以迎合文人雅士愛好為妙。既不落俗套，又有文化味，看來要求挺高。經查閱經典，苦思冥想，忽然想到曾國藩的「求闕闕」。借其寓意，不是恰於好處嗎？

一八四五年，曾國藩為自己的書齋自署「求闕齋」。「闕」，即「空缺」之意。曾氏來源於《周易》。他從讀《易》生發感慨，領略「陰陽相生，一損一益」之理，繼而悟出「物生而有嗜欲，好盈而忘闕」之規律：最後道出為防盈戒滿，故以「求闕」名其齋之用意。並提出：「凡外至之榮，耳目百體之嗜，皆使留其闕。」那正是手握重權的曾氏事業興旺之時，一般人容易沾沾自喜，但他卻能在得意之時保持謙虛，在名聲騰升之時謀求退隱，始終保持欠缺的心態，修身律己。無怪乎，他成了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。

人們喜歡「盈」，曾氏獨求「闕」，這是一種自知自明。無論是官場，還是商場，都是名利的博奕場，並非想像中的坦途。倘若一味往好處想，沒有預見性和心理準備，遇到變故、挫折，就會猝不及防，陷於被動，甚至墮入陷阱。古往今來，多少追名逐利之人好盈而忘闕，結果樂極生悲！曾國藩「求闕」就是吸取這種教訓，平時常懷敬畏心理，「畏天命，畏人言，畏君父」，堅守為人做官的基本準則，保持一份警醒，不自我膨脹，不驕縱放肆。行有所止，謹言慎行。取這種虛心態度，自然有助於化解風險。

「求闕」不是安於現狀，而是做人做事留有餘地。人生本是要有追求的，人們追求「完美」，是一種向上的生活觀。理想是人生的導航燈塔，為你指明前進的方向。但又必須明白，「完美」只存在於人們意念之中，如果人生真有「完美」無缺，那就無發展空間了。「完美」也說是「圓滿」，無論是從哲學上講，還是從現實上看，理想意義的「圓滿」並不存在。以地球而論，也是近於橢圓形。就算承認十五的月亮圓，也是「方其圓時，即其缺時」，水滿則溢，月盈則虧。其實，世間萬物皆有殘缺，花朵美豔會凋謝，朝陽燦爛有時辰，春光雖美不長久。所以，就有「殘缺美」之意境，「斷臂維納斯」格外受到人們欣賞。

## 三「釣」梁詩正

安立志



文史叢譚

《清代文字獄檔》（原北平博物院文獻館編，上海書店，一九八六年。以下只注頁碼）有一則「富勒渾奏梁詩正謹慎畏懼摺 繳回朱批稿」。這份奏摺，涉及三個人物，隱身幕後的自然是乾隆皇帝弘曆，他是事件的主導者。上摺人富勒渾，時任浙江按察使，分管浙江的公檢法，相當於今天的省政法委書記。此人居官，多次因貪瀆被劾奏罷免。賦閒在籍的梁詩正，曾任四部（戶、兵、刑、吏）尚書、協辦大學士，因父年高，疏乞終養。此時身份比較尷尬，這份有關他的奏摺，他完全蒙在鼓裡。

有史家稱，弘曆是雄猜之主。乾隆十七年（一七五二），梁詩正在朝中身被小挫，心生退意，經皇上批准，回故鄉杭州養老。這卻引起弘曆的猜疑，「終養非其本意」，「在籍諒有怨言」。他任命富勒渾為浙江按察使，當其赴任之時，弘曆特意「密囑」之，指使富勒渾要對梁詩正「留心體探」，「據實奏聞」（一百零二頁），亦即對他進行心理偵察或精神監控。主子發話，奴才跑腿。剛獲新職的富勒渾，為報「天恩」，自然盡心。他竟然以曾為梁詩正下屬之便，以探視為名，「面試其心」。這有點像「釣魚」，釣者當然是皇帝，魚鉤則是富勒渾，梁詩正則是那條可憐的魚。不過皇帝所釣，不是有形的活魚，而是無形的「心口」，即梁詩正是否「心存怨尤」，「口出怨言」。

一「釣」梁詩正。富勒渾剛抵杭州，牢記聖諭，便以舊屬之名「親往拜謁」梁府。此時的梁詩正已經在家賦閒三年。富勒渾在向皇上的密報中敘述

說，此次拜謁不過「應酬通套，寥寥數語」（一百零二頁）而已，他這樣分析：「蓋以奴才為滿州世僕，而又屢蒙恩用」，「一時難以深信，是以語言避忌」（同上）。富勒渾沒有發現什麼行跡，沒達到任何目的。

二「釣」梁詩正。只過了半個月，聽說梁詩正患了耳疾，富勒渾抓住機會，再到梁府探望。這一次「漸覺親近」，富勒渾不露形跡引出敏感話題，即剛剛發生的「詆訕」朝廷的胡中藻詩抄案。不想，梁詩正卻痛斥胡中藻，「藻狂悖喪心，理應寸磔」（一百零二頁）。沒想到，朝廷「竟從輕辦理，仰見聖主，法外之仁」（一百零三頁）。梁詩正的意思是說，胡某罪該萬死，皇上寬厚仁慈。這番話，既與中央保持了一致，又於無形中歌頌了皇帝。當然，他也就此案談到一些人生教訓，「筆墨招非，人心難測，凡在仕途者，遇有一切字跡，必須時刻留心，免貽後患。」（一百零三頁）既似交心之言，又象避禍之道，富勒渾卻沒有抓到任何把柄。

三「釣」梁詩正。富勒渾沒有「釣」到梁詩正對皇上的「怨言」，單憑這些材料根本無法滿足「聖意」。機會是人創造的。時值楊梅新熟，富勒渾於是給梁府送去兩簍楊梅。梁詩正是書法名家，作為回禮，他給富勒渾送去單條一副、字對一聯。這個最在意筆墨招非的前官員，竟然以對聯相送，說明他已經對富勒渾沒了戒心。富勒渾也感到彼此「漸次熟識」，於是第三次登門拜訪。這次的確拉近了距離，梁詩正談到皇帝出巡、兒子家書等問題，「似無疑忌」。富勒渾再次拋出胡中藻這個魚餌，梁詩正疏於防範，開始向故人道出官場秘籍：「一



雙飛

（攝影）李 波

## 教育創新須放低身價



自由談

在我們的慣性思維中，師德尊嚴不容挑戰。於是發生在武漢理工大的一起所謂「胯下之辱」的教學嘗試便成為熱門新聞。五月十一日晚上，武漢理工大學的計算機科技學院的副教授張能立在講授「解決問題的思維與策略」的選修課時，主動趴在教室前門，要求學生「凌辱」他。老師的舉動震驚了在場的一百五十餘名大學生。在張副教授的一再鼓勵下，一百多名學生跨過了老師的身體。此舉是何用意？張副教授解釋：跨過老師，只是表象，傳遞的卻正是這種敢於用科學真理否定權威、反抗權貴的精神。

有圖有真相，張副教授的較真勁之所以引起輿論喧嘩，關鍵在於此舉至少扯動了公眾兩根神經：一根是師德尊嚴的神經，即張副教授「自取其辱」與師德尊嚴的思維定式是否融合；另一根是這種舉動是否就是教育創新。

眾所周知，胯下之辱典故來自於曾受街頭流氓侮辱的韓信。而自古以來，胯下似乎是國人最不能忍受的道德律之一。常人尚且不堪忍受，更強調師德尊嚴的教育體制更視之為禁區。不過，要弄清張副教授此舉是否含有屈辱性，有必要弄清其動機。張副教授所授課為「解決問題的思維與策略」，從現今社會發展看，新思維能否解決問題，往往在於反其道而行之，或者嘗試突破人們傳統思維自設的「雷區」。很顯然，胯下就是道德尊嚴的禁區。按照張副教授的解釋，此舉的意義不在於道德，而是「用科學真理否定權威、反抗權貴精神」。從這一角度看，張副教授的舉動雖然大膽，但仍不乏創意，尤其是這樣的驚愕之舉或許更能激發學生們僵硬思維冰山的消融。

此舉也看不出對師德尊嚴有何傷害之處，換句話講，過於強調形式的儀式感，表面上看似維護了師德尊嚴，但這種依靠表面儀式製造的道德高地，能否真正贏得學生的尊敬顯然是未可知數。倒不是說學生不應該尊敬老師，但老師的尊嚴首先來源於「傳道授業解惑」，而非設立帶電的「師德圍牆」。

近年來，一些學校一些老師有過不少有益的嘗試。譬如有位校長為兌現承諾，當學生面親吻了一頭小豬。放在過去，怎麼看都有些粗俗不堪，而在今天這個開放的時代，這樣的互動只會贏得學生們的好感，當然還有尊敬。相反，板着脸說教不可能收到這樣的高效。

在反思教育問題時，各界人士矛頭齊齊指向應試教育，同時孤心苦詣地呼喚素質教育。提倡素質教育就必須打破應試教育的破爛爛罐，其中就包括改變填鴨式灌輸，以更能激發學生創新思維能力的方式推動教育。我們可以認為，改變傳統填鴨式灌輸的教學模式也是一種教育創新。當然，這也絕非倡導為了改變而改變，所有嘗試必須有助於推動教學。

事實上，近年來一些教育工作者在教學方面的成功嘗試，究其根本在於強化師生互動。師生能否有益互動必須突破看不見的身障障礙，即傳統意識中的師德尊嚴。在傳統填鴨式教育模式下培養出來的學生，之所以缺乏創新思維，根本一點在於對師德權威言聽計從，不敢反駁。

## 新加坡感想

楊繼良

程。八〇年前後，遷居香港。我不敢對她家猜想他們也必定經歷了無端被批鬥的歷程。

實生活基本滿足需要，對民主自由的要求，自然會被提出來。」後李光耀時代，各方面很可能會有一些改變。

研究所有位馬來亞華裔共產黨員。中國解放後，東南亞華僑懷赤子之心，大批回國。五十年代中期以後，反右、大躍進直到文革，嚴重排斥，歷時二十年，連共產黨員也不能倖免。改革開放後，紛紛離去。這位先生有過同樣的經歷，被新加坡收留了。凡我見過同鄉的經商，在中國都備受折磨，無一例外。他們都是抱着火熱的愛國之情回來的，真替他們呼冤！我有一個香港學生的父母，在解放初期回中國，一九八〇年前後，遷居香港。我不敢對她家猜想他們也必定經歷了無端被批鬥的歷程。

從上世紀九十年代起，新加坡就大量招徠知識分子和技術人才，新移民中不少遇到好幾位從大陸過來的年輕的食肆教授。研究所圖書館管理員，陪他過周末，一家人都從中國新來，全家都稱讚新加坡好。新加坡地處赤道，氣候不宜給我，我的印象是，大家都認為踏入新加坡就能有比較好的住宿條件，可以以承擔的價格獲得體面的「組屋」。組屋是吸引國人來新的主要動力。分期付款給新加坡人，但只有九十九年的使用權，到期後必須還給政府，而且住戶不能在產業上改建。為便利我們華人固有的「家庭養老」，三代同堂的傳統，於是有了三居室、四居室，甚至有六居室（同時又使年輕夫婦有自己的空間）的安排。對這一政策，毀譽參半，也有把它說成是「酷政」的。從西方的私有財產觀來看，正如「居者有其屋」，耕者有其田，是孫中山的理念，是人民盼望的「仁政」。大陸解放後第一件「土改」，做到「有其田」；「到近年才開始推行。香港去年「佔中」亂局，看來和青年人對住房不滿也有三個關係。

我訪問過三四戶住「組屋」的人家，覺得乾淨、舒適；主人都是從中國大陸過來的，他們一定對在新加坡的工作和生活條件，與國內作過研究、比較，才做了這樣的選擇。我在香港科技大學時，那一屆有四、五個會計系的新科博士，其中就有一個帶了新婚的妻子去新加坡；如果他去新加坡，他完全可以和其他幾位同科博士一樣去清華。他當然也是仔細比較後才作此決定的。兩個在當地取得碩士學位後，到加拿大獲得了博士的同胞。其中一個回到新加坡，在州立大學任教；另外一個去了新加坡，他完全不難在美國任職，但他作了別樣的選擇。

隨着社會秩序已長期穩定，人民物質生活基本滿足需要，對民主自由的要求，自然會被提出來。」後李光耀時代，各方面很可能會有一些改變。



東西走廊

李光耀逝世後，國內電視台紛紛播出了紀念節目，勾起了我二十三年前的一次訪問新加坡的回憶。那時，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在招徠買馬。我當然早已「超齡」，但還是去信聯繫。對方客氣地邀我作一次短期訪問。我現在出遊，首先去的必是新、馬、泰，那裡的美景建築和習俗，不需要我多嘴。對新加坡的政治，美國人從他們的傳統觀點出發，頗有微詞。在我的那次訪問前後，這裡的一位老外教授也去那裡，回美國後說在飯店裡不敢和同伴講批評政府的話。也在那時，有一個美國青年，帶着一群人在街頭用臭雞蛋和油漆亂塗多輛汽車，遭罰款、監禁、還受鞭笞；美國總統親自出面要求赦免，仍被打得屁股上留下終身疤痕。我仍在美國聽到的評論是，那個島國不民主而且野蠻。美國人對民主自由的崇拜，根深蒂固；我在加州伯克利大學學校到打工處經過一個縫洞，滿牆都是鴉鴉。被清除後，不但不會使人愛惜乾淨的牆壁，反而更招徠青少年們的雅興。各族人民理念不同。作為中國人，我覺得這種放縱完全要不得；新加坡的「強人統治」，我看很有必要。我一個星期逗留，留下最深刻的印象，是他們不遺餘力地愛惜和招徠人才。

隨着社會秩序已長期穩定，人民物質生活基本滿足需要，對民主自由的要求，自然會被提出來。」後李光耀時代，各方面很可能會有一些改變。